

女性权力与族群认同：阿玛拉松塔政治参与二重向度的考察

刘榕榕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2)

摘要: 526年, 东哥特王国的开创者塞奥多里克去世, 王位由外孙阿塔拉里克继承。因阿塔拉里克年幼, 其母阿玛拉松塔摄政。阿玛拉松塔有意在王国中促进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的融合, 这一目标同哥特人日益强化的族群意识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其施政引起哥特贵族势力的反对。阿塔拉里克去世后, 阿玛拉松塔失去权力并丧命。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缺乏保证女性独立执政的社会环境、法律基础和权力机制, 女性权力具有显著的依附性, 这是阿玛拉松塔摄政政权垮台的关键原因。阿玛拉松塔政权的垮台则成为该时期地中海世界政局发生显著变化的重要契机。

关键词: 东哥特王国; 阿玛拉松塔; 族群认同; 女性权力

中图分类号: K1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1-0199-10

公元5至6世纪, 地中海世界西部地区先后出现多个蛮族^①王国, 其中, 塞奥多里克(Theoderic, 493—526年在位)建立的东哥特王国统治着罗马国家的发源地——亚平宁半岛。公元526年, 塞奥多里克去世, 由于他的外孙兼继承人阿塔拉里克(Athalaric, 526—534年在位)年幼, 作为塞奥多里克之女、阿塔拉里克之母, 阿玛拉松塔(Amalasuntha)于526至534年为其子摄政^{[1](139)}。534年, 阿塔拉里克离世, 在阿玛拉松塔扶持下, 阿玛尔(Amals)家族成员塞奥达哈德(Theodahad, 534—536年在位)成为新王^[2]。塞奥达哈德上台不久, 阿玛拉松塔就遭受囚禁并丧命^{[3](8)}。从阿玛拉松塔掌权至垮台, 前后历时8年, 这段时期不仅见证了东哥特王国政权建构中罗马元素与日耳曼元素互动的复杂关系, 也为后人展示了地中海世界蛮族王国中贵族女性的政治选择与权力界限。

在国外有关阿玛拉松塔的研究成果中, 这位王室女性的活动常在通史作品中得到简略叙述^{[4](149-150)[5](129)[6](7)(383-384, 386)}, 或是在研究其他政

治人物及事件时有所涉及^{[8][9](104-106)[10](8)[11]}, 又或是以阿玛拉松塔和其他人物之间的关系为研究对象^[12-13]。而国内只有少数几篇论文在论述东哥特王国历史发展时简要提及阿玛拉松塔的政治活动^[14-16]。总体而言, 对阿玛拉松塔自身性别对其执政产生的不利影响以及东哥特王国内部族群认同^②与其丧失执政权力之间关系的关注有待提高。有鉴于此, 笔者结合政治史与女性史研究视角, 尝试对这一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以求教于方家。

一、阿玛拉松塔的摄政背景与施政概况

西罗马帝国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努斯(Romulus Augustulus)于476年被蛮族将领奥多亚克(Odoacer)废黜, 西罗马帝国政权自此消亡。同一时期, 东罗马帝国皇帝泽诺(Zeno, 474—475年、476—491年在位)因忙于应对利奥一世(Leo I,

收稿日期: 2023-01-13; 修回日期: 2023-06-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晚期罗马帝国与周边‘蛮族’关系研究”(19ASS002)

作者简介: 刘榕榕, 女, 湖北麻城人, 历史学博士, 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世界古代中世纪史、拜占庭史、晚期罗马帝国史, 联系邮箱: liurongrong1985515@163.com

457—474年在位)遗孀维瑞娜(Verina)的兄弟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的叛乱而无暇西顾^{[3](132)},无奈之下默许了奥多亚克对亚平宁半岛的统治。之后,为了摆脱在巴尔干半岛对帝国安全造成威胁的东哥特人,泽诺授意东哥特人的首领塞奥多里克前往亚平宁半岛^{[17](16)}。493年,塞奥多里克设计铲除奥多亚克,建立了东哥特王国^{[3](13-14)}。由此可见,东哥特王国的创建是以西罗马帝国政权的衰亡以及同时期东罗马帝国的内忧外患为历史契机的。学者曾指出,泽诺在位时期,不得不通过重金收买并说服东哥特人领袖塞奥多里克放弃在希腊地区的抢劫活动,转而进攻意大利^[18]。

作为王国开创者,在位长达30余年的塞奥多里克的系列政策为东哥特王国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与方向。没有男性子嗣的塞奥多里克原本希望女儿阿玛拉松塔的丈夫尤萨里克(Eutharic)能够继承王位,尤萨里克的继承人身份也得到时任东罗马皇帝查士丁一世(Justin I, 518—527年在位)的承认^{[17](101)}。然而,在尤萨里克与阿玛拉松塔成婚7年后,这位王位继承人就于522年去世,留下了幼子阿塔拉里克。526年塞奥多里克去世后,阿塔拉里克即位,因年幼,由其母阿玛拉松塔摄政^{[1](139)[19](15)}。

摄政期间,阿玛拉松塔在宫廷政治、国政治理、军事外交等多个领域统领王国事务。其一,阿玛拉松塔采用“罗马式”教育理念培养儿子阿塔拉里克,任命哥特人中三位谨慎的长者陪伴在阿塔拉里克身边^{[19](17)},进而操控在位者的教育。其二,阿玛拉松塔全方位管理政府事务^{[20](15)}。面对国内对其权力的质疑和挑战,阿玛拉松塔既有妥协之举,如在阿塔拉里克的教育问题上作出让步^{19},又有强硬策略,放逐乃至处死了对其施政持反对意见的哥特贵族^{[19](21-23)},以儆效尤。其三,阿玛拉松塔主动加强与东罗马政权的关系。在东罗马帝国与汪达尔王国的战争中,阿玛拉松塔为东罗马军队提供援助^{[20](127)},在国家外交事务方面展现了个人意志。其四,面对阿塔拉里克早逝所诱发的王国最高权力者缺位的危机^{[1](139)},阿玛拉松塔指定堂兄塞奥达哈德为王位继承人并与自己共治^{[17](131-132)},以此延续家族在亚平宁半岛的统治地位。

综上所述,随着塞奥多里克的去世与阿塔拉里克的继位,作为延续家族统治的纽带,阿玛拉松塔上台摄政并在内政外交等诸多方面作为王国的实际统治者发挥重要影响力。而在诸多施政举措中,扶持新王上台形成共治局面虽暂时延续了其家族在王国的统治权,但也是导致阿玛拉松塔摄政权力丧失、生命终结的诱因。为了尽快独揽大权,上台后的塞奥达哈德与王国内反对阿玛拉松塔施政方针的势力成为盟友,迅速将阿玛拉松塔囚禁并杀害^{[3](8)}。阿玛拉松塔之所以在王位更替后迅速丧失权力,一方面,是因为她希望融合王国治下的亚平宁半岛原有罗马传统与哥特元素的施政措施同王国内部哥特贵族的族群意识发生了激烈碰撞;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的地位与身份均从属于男性,阿塔拉里克的离世让阿玛拉松塔失去了权力合法性的来源,新王的上台则导致完成权力过渡与转移任务的阿玛拉松塔彻底失势。

二、哥特人族群意识的强化与阿玛拉松塔“亲罗马”政策之对立

在新王上台后,阿玛拉松塔很快沦为阶下囚并丧命,这一结果看似偶然,实则必然。随着东哥特王国在亚平宁半岛统治势力的日趋稳固,王国核心权力阶层——哥特贵族强化了本族群利益至上及王国政权独立的意识。这与阿玛拉松塔摄政时期有意在其治下的亚平宁半岛利用王国中既有的罗马元素,主动向东罗马政权示好,进而稳固家族统治地位之国策相悖。阿玛拉松塔所推行的政策被东哥特王国统治阶层视为严重有损于哥特人群体利益且削弱族群特征的“亲罗马”政策,双方背道而驰的理念及其诱发的内争严重威胁了这位女摄政的地位。

阿玛拉松塔摄政时期所推行的政策,总体上延续了其父塞奥多里克政策中“亲罗马”的一面。塞奥多里克曾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1](129)},他率部前往亚平宁半岛乃至其后统治意大利地区、获得执政官头衔以及确定王位继承人选等各项事务,均得到了东罗马皇帝的支持或认可^{[17](25-26,101)}。塞奥多里克在位时期,尤其是在位前期,维系与

东罗马政权的和谐关系是出于国家建构的实际需要。就人口数量而言，东哥特王国中的统治者哥特人及其贵族阶层属于王国中的少数派。研究成果表明，跟随塞奥多里克进入亚平宁半岛的哥特人为 3.5 万~4 万，至多不超过 10 万，而意大利地区的原有居民将近 400 万^[21]。在人口比例如此悬殊的状况下，当东哥特王国统治者考虑如何在亚平宁半岛保证长治久安的问题时，原有的罗马帝国时期的统治模式、机构及东哥特王国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必然受到重点关注。

众所周知，作为东哥特王国核心区域的亚平宁半岛，是原罗马文明成长并存续千余年的核心地区。无论是政治理念与制度、经济模式与体系，还是宗教信仰与文化，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统治结束后，罗马文明遗产在亚平宁半岛仍然长期发挥影响。费迪南·洛特指出，西罗马帝国衰亡后，意大利地区的社会结构并未立即发生根本性变化，不仅行政体系维持原样，行省制度仍旧存在，市政与财政体系也一如既往地发挥作用。罗马元老院、总督、执政官依然存在于意大利地区，民众也保持着原有的生活方式^{[22][239]}。有鉴于此，塞奥多里克希望从罗马帝国的继任者——东罗马帝国获得认可，同时借鉴有深厚积淀的罗马物质和文化遗产，服务于社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的东哥特人的国家政权建设，进而巩固家族及哥特人在亚平宁半岛的统治。因此，塞奥多里克在位时期，在国家治理方面，罗马法在东哥特王国得到了传承与接受^[23]。卡西奥多鲁斯笔下曾多次出现塞奥多里克就重要事件致信罗马元老院的记载^{[17][28,32,35,49,61,84,89]}。

需要注意的是，塞奥多里克的内外政策并不仅仅只有“亲罗马”的一面，实际上，在处理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时，塞奥多里克始终坚持王国利益为上。塞奥多里克希望在地中海世界多股势力并存的情势下寻找平衡点，确保王国的战略地位并拓展其势力范围。西罗马帝国覆亡前后，西地中海世界出现了法兰克王国、汪达尔王国、勃艮第王国、西哥特王国等蛮族政权，东罗马帝国控制着几乎整个东部地中海世界；东哥特王国所辖区域位于东罗马帝国与西部蛮族王国的中间地带。塞奥多里克在位时期，其外交政策并不仅仅停留在与东罗马政权保持稳定关系，而是多措并举，在扩充军力的同时，结

合外交手段，精心布局以为王国赢得战略优势地位。为此，塞奥多里克迎娶了法兰克王国国王克洛维一世(Clovis I, 481—511 年在位)之妹奥杜弗雷达(Audofleda)^{[1][137]}，将两个非正妻所生育的女儿西迪格图(Thiudigoto)和奥斯特罗格托(Ostrogotho)分别嫁给西哥特国王和勃艮第国王^{[1][137]}，将妹妹阿玛拉弗瑞达(Amalafriada)嫁给汪达尔国王^{[1][137]}，试图与西地中海世界重要蛮族政权构建一个以家族为中心的婚姻网络^[24]，进而建构以东哥特王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

经过塞奥多里克 30 余年的苦心经营，东哥特王国发展成为国家治理体系渐趋完备的政权，历经近一个世纪政治动荡和经济衰退的意大利地区重新恢复了活力，开始稳定发展^{[10][241]}。与此同时，统治东罗马帝国的泽诺、阿纳斯塔修斯一世(Anastasius I, 491—518 年在位)、查士丁一世等皇帝由于将精力主要用于内政治理以及应对与东部萨珊波斯和北部蛮族的战争^{[3][132][25][26][107,112][27][220,224,225—226][28][181][29][222][30]}，虽然拥有恢复旧日罗马帝国荣光的雄心壮志，但有心无力，唯有通过授予西部蛮族统治者以头衔和荣誉^{[17][101][27][212]}、伺机介入西地中海世界蛮族政权的摩擦与对抗^{[17][37]}等方式，插手西部地中海世界的军政事务。在国内外局势均出现变动的情势下，坚守哥特人群体利益的东哥特王国统治阶层，自然而然地加强了王国政权的自主性和哥特人的族群意识。盖伊·哈萨尔指出，随着统治日趋稳固，塞奥多里克在位后期更强调哥特人自身的英勇和力量是族群统治亚平宁半岛的合法性来源^{[31][290]}。在强敌环伺下，东哥特王国上层人士对不时利用蛮族间冲突渔利的东罗马政权不仅反感，而且保持了高度警惕。

根据史家记载，塞奥多里克与东罗马皇帝泽诺多次因利益冲突出现摩擦^{[32][63]}。之后，在宗教问题上，塞奥多里克抗议并抵制查士丁一世禁止阿里乌斯派(Arianism)信仰的决定^[33]。塞奥多里克还以叛国罪囚禁并处决了罗马元老贵族波爱修斯(Boethius)^{[19][13]}，同时遭到囚禁的还有波爱修斯的岳父西马库斯(Symmachus)，借口是波爱修斯等人与东罗马政权关系过于密切。由此可见，塞奥多里克并未一味服从东罗马帝国，而是在借

鉴东罗马政权治国理念的同时,向其展示两国具有同等地位。塞奥多里克的这些措施,本身反映了哥特贵族群体对东罗马帝国的态度。东罗马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一世曾经为法兰克国王克洛维一世提供支持,插手西地中海世界蛮族王国之间的争斗,此举当即就引起以塞奥多里克为代表的东哥特王国上层社会的强烈不满^{[17](37)}。

伴随权位日益稳固、治国经验逐步积累、文化渐趋发展,以及罗马军政势力在西部地中海世界日渐消失,塞奥多里克利用罗马物质与文化遗产以巩固哥特族群统治权力与核心利益的政策,极大强化了王国内部哥特贵族群体的族群认同以及作为亚平宁半岛统治阶层的角色认知^[34]。由此形成历史的吊诡:东哥特王国在塞奥多里克时期的发展壮大,来源于塞奥多里克有效利用罗马元素和坚持东哥特王国的主体性;而随着东哥特王国的发展,东哥特王国的主体性与哥特贵族群体的族群认同日益高涨,结果至塞奥多里克统治晚期,在哥特贵族群体中却萌生了对王国内部罗马元素和理念以及对东罗马帝国的怀疑与不满,并由此威胁到此前塞奥多里克施政的政策根基以及王国赖以壮大的重要条件之一,即善加利用罗马元素并与东罗马帝国保持友好关系。阿玛拉松塔摄政后,她的施政措施更为重视继承塞奥多里克政策中“亲罗马”的一面,这必然进一步引起哥特贵族的不满。

正因为如此,阿玛拉松塔试图在亚平宁半岛延续并深化罗马元素的种种做法,均被族群意识强烈的哥特贵族解读为不利于族群发展且有损国家利益的行为。最为典型的事例是,阿玛拉松塔沿用塞奥多里克为自己所选择的“罗马式”教育方式^[35]培养阿塔拉里克,由此引发了以哥特军事贵族为首的王国统治阶层的强烈反感,反对者对此相当愤慨并公开批评^{[19](17)}。

阿玛拉松塔为阿塔拉里克设置的教育模式引起轩然大波的主要原因在于,在哥特贵族看来,“罗马式”教育中包含的古典元素与军事能力存在对立^{[36](96)},他们强调经典阅读的教育模式会严重削弱哥特人原本突出的军事特性。在东哥特王国30余年的发展过程中,哥特人军事方面的优势本就因经济上依赖当地原罗马人和行政

上模仿罗马国家架构而遭受挑战。肖恩·D.W.拉弗蒂指出:“在东哥特王国内部,哥特人与罗马人的角色得到明确区分。占据统治阶层的哥特人,其主要职责是通过武力保护国家免遭外部军事威胁和应对内部叛乱,进而确保和平。作为回报,哥特人获得了由罗马人提供的税收和福利。”^{[10](106)}帕特里克·阿莫里进一步指出:在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凭借武力成功夺取统治权后,与意大利当地间经济纽带的强化侵蚀了哥特士兵对族群的忠诚度和认同感^{[36](164)}。

在哥特贵族看来,国君的教育不仅关乎个人,而且攸关族群和国家发展,应当选择能够满足东哥特王国统治阶层核心利益的方式。在罗马式教育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国君有可能出于对罗马文化的认同而更加亲近作为潜在敌人的东罗马帝国,从而做出不利于哥特人群体利益的决策。哥特贵族因此认为,在国君教育中注重罗马元素并弱化族群军事特征,不仅将导致哥特人丧失族群特性及核心利益,并削弱王国统治者应对外来军事危机时的作战能力,而且在教育模式上以罗马为借鉴和模仿对象将不利于在地中海世界的复杂局势中寻求平衡,从而可能威胁国家战略安全。

此外,阿玛拉松塔处理内政的方式也导致哥特贵族深感族群利益受到严重威胁。在关于阿塔拉里克教育方式的争论中,阿玛拉松塔处决了三位重要的哥特贵族,这种做法不仅壮大了王国统治阶层内部敌视阿玛拉松塔势力,也为对方使用暴力提供了口实。爱德华·吉本认为,阿玛拉松塔谋杀三位显赫的哥特贵族引起王国内部臣民的憎恨^[37]。费迪南·洛特认为,阿玛拉松塔的这一举措让自己成为反“罗马派”的牺牲品^{[22](251)}。不仅如此,在阿玛拉松塔上台摄政初期,曾经将塞奥多里克没收的罗马元老财产归还其后代^{[19](17)},此种措施也被视为她试图彻底转变塞奥多里克统治后期“疏离罗马”政策的表现^[21]。

除内政事务之外,阿玛拉松塔还过于主动地向东罗马帝国示好,丧失了塞奥多里克赢得的与东罗马政权的对等外交关系。根据东罗马帝国史家普罗柯比的记载,阿玛拉松塔小心翼翼地维系与东罗马帝国的关系,在国家事务上遵从查士丁

尼一世的意志^{[20](127)}。在东哥特王国内部出现反对势力后，阿玛拉松塔迅速向查士丁尼一世寻求庇护^{[19](21,27)}，她还做好了局势恶化时逃亡至东罗马帝国的准备。阿玛拉松塔当时将包括4万磅黄金在内的全部私财装上船只，预备在政局恶化时逃往君士坦丁堡^{[19](23)}。史家笔下甚至出现了阿玛拉松塔打算将王国送给查士丁尼一世的记载^{[19](27)}。有学者认为，阿玛拉松塔与东罗马帝国秘密商议将意大利交给东罗马皇帝^[12]。在哥特贵族看来，这种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为了加强其个人与东罗马政权之间的关系，而非建基于哥特人的群体利益。

更为严重的是，阿玛拉松塔为东罗马军队远征北非提供军事援助，帮助东罗马军队征服汪达尔王国，由此导致地中海世界整体局势出现了不利于东哥特王国战略安全的变化。在东罗马政权占据以迦太基城为中心的原汪达尔王国统治地区后，东哥特王国的领土(亚平宁半岛)就受到东罗马帝国核心疆域(巴尔干半岛等东地中海沿岸地区)与新获得领土(与亚平宁半岛隔海相望的北非地区)的包夹，在战略上两面受敌，这让熟知军事事务的哥特贵族深感国家安全陷入危机。哥特贵族的忧虑不无道理。事实上，东罗马帝国从未放弃重新收回西地中海世界控制权的想法^[38]，征服汪达尔王国是东罗马皇帝权衡内外局势后开始西征活动的第一步。针对汪达尔人的战争大获全胜，不仅为东罗马帝国向东哥特王国采取军事行动提供了前进基地，也刺激了东罗马皇帝更大的扩张欲望。有学者指出，征服西地中海世界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和准备，而轻易征服汪达尔王国，则为查士丁尼重新征服意大利和罗马提供了跳板^{[31](499-501)}。从历史发展来看，在胜利结束汪达尔战争后不久，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便主动开启针对东哥特王国的战争^{[1](139-140)}。阿玛拉松塔支援东罗马军队远征的外交决策对王国战略局势产生了难以弥补的恶劣影响，也进一步增强了哥特贵族对其政权的离心力。

综上所述，东哥特王国的发展以及地中海世界的局势变化，让东哥特王国统治阶层逐渐形成强烈的族群意识和自身作为亚平宁半岛统治者的自豪感。在族群利益至上的哥特贵族看来，曾

在王国建立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罗马元素已经威胁到东哥特王国的存续。正因如此，塞奥多里克晚年的政策显现出“疏离”罗马的趋势。阿玛拉松塔上台时，由塞奥多里克时期延续而来的“表面罗马、内在哥特”的王国政策面临选择，也就是新政权是继续借鉴与融合罗马元素，还是强化哥特人的族群特征与利益。而选择后者，自然对以武力控制亚平宁半岛并占据王国统治地位的哥特贵族更为有利。

然而，阿玛拉松塔在学习和模仿罗马方面比其父走得更远，甚至还做出了严重威胁王国战略安全的决策。也因此，阿玛拉松塔的内政与外交政策均受到哥特贵族的严重质疑与反对。随着塞奥达哈德上台，哥特贵族立即站在新王一方，导致阿玛拉松塔政权迅速垮台。帕特里克·阿莫里指出，535年，塞奥达哈德将阿玛拉松塔囚禁，借口正是怀疑阿玛拉松塔预备将意大利转送给查士丁尼一世^{[36](10)}。

三、贵族女性的依附性与阿玛拉松塔摄政权位合法性之内在矛盾

除了东哥特王国内部哥特贵族的族群意识与阿玛拉松塔“亲罗马”政策之间的深刻矛盾与对立外，阿玛拉松塔政权垮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女性依附于男性的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由于社会与家庭角色的明确区分，女性缺少独立出现于国家政治领域的权力基础与法律机制。阿玛拉松塔的公主身份来自其父塞奥多里克，摄政身份来自其子阿塔拉里克，在其子去世后，阿玛拉松塔缺乏在东哥特王国独立行使权力的合法性。

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在国家、社会与家庭层面均从属于男性。罗马法赋予了男性在家庭中的主导地位。根据罗马法的规定，不允许父亲在任何方面次于母亲^{[39](82)}。在继承和分割家产时，父亲或祖父的意愿必须得到特别遵守^{[39](56)}。25岁以内的寡妇，如果父亲健在，即便已经脱离父权的制约，她在选择第二次婚姻时，也必须符合父亲的意愿^{[39](70)}。从这一时期的诗歌也可看出，父母对男孩更加期待^{[40](119)}。东哥特王国是对

罗马法传承与接受程度较高的蛮族王国。塞奥多里克在位时期颁布的《塞奥多里克法令集》(*Edictum Theodorici*)充分借鉴了5世纪30年代颁布的罗马帝国首部官方法典《塞奥多西法典》(*Codex Theodosianus*),并以此约束其治下的哥特人和罗马人^[23,41]。对此,拉尔夫·W.马西森指出,在罗马原有权威消失后,地中海西部地区仍然保持罗马法律传统,以维系社会秩序^{[42](104)}。因此,在模仿罗马建国理念的东哥特王国,作为社会最基本单位,家庭内部依然保持着以男性为主的格局。

在国家和社会层面,男性也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在阿玛拉松塔生活的时代,制度本身并没有女性行使公共权力的正式规定,甚至反对女性参与公共事务。学者指出,在这一时期,男性和男性行为构成了社会规范,而女性的角色受制于由男性订立的准则。女性需要待在家中,远离所有的公共活动。女性的政治,抑或“公众的”生活受到了严格限制。她们在国家、教会、军队层面均没有一席之地^{[43](35)}。特定的公共角色与事务被认为是“男人之事”,女性不适合参与。这种对不同性别角色的态度深深植根于古代文化之中^[44]。这一时期,国家层面几乎所有公职只向男性开放,男性占据了宫廷、官僚机构和军队中的所有职位以及几乎所有教会中的神职^[45]。

由此可见,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依附于男性、女性与男性拥有不同社会与家庭角色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女性时常被定性为软弱和不可靠的人,在法律地位、受教育机会和行动自由等方面受到区别对待^{[40](118)}。正因如此,这一时期的女性群体在政治、军事和外交等公共事务中的整体参与度不高,能够行使军政、外交权力的女性在整个女性群体中所占比重较低。少数参政女性,如东罗马帝国利奥一世的皇后维瑞娜、查士丁二世的皇后索菲亚(*Sophia*)、莫里斯(*Maurice*, 582—602年东罗马帝国皇帝)的皇后君士坦提娜(*Constantina*)等,其施政背景几乎均是国家面临政局不稳、军事压力等的特殊情况^{[28](132)[29](423)[46]},并且大多具有暂时的过渡性特征。学者就此指出,政治混乱令部分女性获得跨越通常的行为界限并承担男性角色的机会^{[42](211)}。

从阿玛拉松塔出生开始,作为女性的她就并非父亲塞奥多里克所认定的王位接班人。从塞奥多里克着力为阿玛拉松塔寻找伴侣尤萨里克并力促东罗马政权认可尤萨里克的继承人身份就可以看出,作为女性的阿玛拉松塔无法直接成为东哥特王国的统治者。塞奥多里克为阿玛拉松塔安排的“罗马式”教育没有引起哥特贵族的愤慨,其中的重要原因也是阿玛拉松塔并非未来国君的人选。常年生活在宫廷中的阿玛拉松塔,其本职是生育与教导子女、管理宫廷事务。实际上,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一旦成为母亲,就意味着女性需要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于子女^[47]。

东哥特王国王位交接过程中出现的原有继承人早逝、幼子登基的特殊情况为阿玛拉松塔提供了执掌政权的机会。初登王位的阿塔拉里克年仅8岁,必须由长者给予有效引导。为防止权力旁落并确保家族统治稳固,同时杜绝家族外的男性夺权,在缺乏适当的男性候选人时,摄政者往往会从与在位者有直接血缘关系且较为年长的王室女性成员中产生。这一时期,地中海世界先后出现了多位由年长的母亲或姐姐代为执政的统治者,如:塞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II*, 408—450年东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Valentinian III*, 425—455年西罗马帝国皇帝),希尔德贝尔特二世(*Childebert II*, 575—595年奥斯特拉西亚王国国王),克洛塔尔二世(*Chlothar II*, 584—629年纽斯特里亚王国国王)等幼年即位时,就分别是由普尔克里亚(*Pulcheria*)、加拉·普拉西迪亚(*Galla Placidia*)、布隆希尔德(*Brunhild*)、弗雷德贡德(*Fredegund*)等女性摄政^{[26](15)[48-50]}。从家庭角度看,王室女性拥有控制子女生活的合法性^[51]。与此同时,存在直接血缘关系的女性摄政者能够为年幼在位者提供有力保护。苏拉密斯·萨哈认为,代表年幼的在位者行使摄政权是母亲的正规职责,也是被赋予的正式权利^[52]。传统习俗和意识允许一位母亲代其子控制政府^{[43](44)}。

因此,幼主之母的身份是阿玛拉松塔摄政的基础与关键。凭借与尤萨里克的婚姻以及为其子阿塔拉里克摄政,阿玛拉松塔在东哥特王国王位与王权转移过程中充当着重要角色:王位继承人阿塔拉里克由于年幼而无法正常行使王权,且幼王

的人身安全与其王位都需要长辈保护，阿玛拉松塔的任务便是在国王能够独立行使王权前代替其治国理政、防止王位旁落，从而保证王位的传承与王权行使的连续性。正如哈里森所言，作为母亲，阿玛拉松塔有效履行了王位过渡者的角色^[53]。

在缺乏女性执政先例与社会氛围的东哥特王国，认为女性缺少执政能力的固有观念导致哥特贵族对阿玛拉松塔的摄政缺乏信任 and 安全感。回顾阿玛拉松塔 8 年摄政生涯，阿玛拉松塔的政治才能事实上并不构成其倒台的必然因素。绝大多数近现代学者对阿玛拉松塔的能力持较为正面的评价，认为她接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语言、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聪明且果敢^{[4](149)[7](383)[9](104)[32](119)}。阿玛拉松塔摄政期间的诸多内外政策，从根本上说，也并未彻底颠覆其父的政治主张，所谓出卖东哥特王国的指控很可能出自政敌的攻击。然而，正是在对女性执政的疑虑和猜忌情绪的影响下，原本能够接受或部分接受塞奥多里克做法的哥特贵族完全无视阿玛拉松塔施政的出发点。学者指出，在这一历史阶段，女性的生活被传统信念和观点束缚，女性必须依照男性意愿行事^[54]。一旦认为阿玛拉松塔的施政与其设想的方向出现了偏差，哥特贵族便站在其对立面，以捍卫他们所认为的哥特人群体利益。A.H.M.琼斯指出，哥特贵族无法接受女性掌权者，这是阿玛拉松塔在东哥特王国的统治难以持久的重要原因^[55]。

由于受到传统、习惯的引导以及法律的制约，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认为女性无法独立长期执掌权力的观念根深蒂固。534 年，阿塔拉里克离世导致阿玛拉松塔政权的合法性和连续性面临危险^{[32](258)}。阿玛拉松塔本人也意识到，她的政治地位由于她的性别而易受攻击，这是其无法扭转的弱点。在阿塔拉里克死后，阿玛拉松塔希望通过扶持傀儡塞奥达哈德上台延续其政权。阿玛拉松塔认为，只要自己向塞奥达哈德示好，对方必定就会接受^{[19](35)}。然而，个人恩怨或友好关系在政治权力的争夺中一般不具有决定性意义。罗伯特·布朗宁指出，阿玛拉松塔希望塞奥达哈德满足于享受国王的物质待遇，而自己则掌握实权，这种想法太过于理想主义^{[9](105)}。

随着阿塔拉里克的离世以及塞奥达哈德的

上台，因阿塔拉里克之死所导致的东哥特王国王位继承危机已经结束。作为一名失去权力合法性来源的女性，阿玛拉松塔在东哥特王国政治体系中的地位是不堪一击的，这注定了她的失败。约翰·W.巴克尔认为，一旦阿塔拉里克离世，阿玛拉松塔便无法保持权力^{[4](150)}。还有学者指出，534 年阿塔拉里克的离世，暴露了阿玛拉松塔政权的脆弱性^{[5](533)}。塞奥达哈德是一位成年已婚男性，难以代替成年男性执政且无法嫁给新君的阿玛拉松塔失去权力是必然的。凯特·库伯认为，阿玛拉松塔扶持男性成为自己的政治搭档，这种策略不同于女性通过婚姻进而传递权力的传统方式，它具有高度风险性^[56]。阿玛拉松塔希望继续保持权力的意图难以被塞奥达哈德以及反对其执政的哥特贵族所容忍，也无法得到认同传统习俗的民众的支持。

此外，阿玛拉松塔之所以在危机中无力自救，与男性垄断了东哥特王国所有军职有重要关系。在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在军事领域同样受到排斥。这一时期，女性很少统兵作战或参与战争，特例仅有 3 世纪的帕尔米拉女王芝诺比娅(Zenobia)、4 世纪的阿拉伯女酋长玛维娅(Mavia)与罗马帝国皇后多米尼卡(Dominica)、6 世纪的军事将领贝利撒留(Belisarius)之妻安东尼娜(Antonina)等寥寥数人^{[20](111)[57-58]}，而阿玛拉松塔则不在这些人之列。缺少直接领导军队以及担任军职的机会，是阿玛拉松塔在政治斗争中难以弥补的劣势。有学者指出，由于哥特军队无法接受一位没有军事领导能力的女性统帅，在塞奥多里克去世后，军队并没有掌握在阿玛拉松塔之手，而是先后由图鲁因(Tuluin)和里贝瑞乌斯(Liberius)控制^{[36](9,92)}。

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蛮族王国，面对地中海世界复杂的局势，军功是统治者政权稳固的最重要保障。卓越的军功是阿玛拉松塔之父——塞奥多里克王位稳固的关键。塞奥多里克曾长期率领东哥特士兵东征西战，并一手建立东哥特王国^{[26](28)[27](212-213)}。凭借军功，深具威望的塞奥多里克能够通过精巧的政治操作保持哥特人内部不同派别的长期平衡，让东哥特王国虽披上罗马的外衣，但仍旧维系着哥特人的统治地位。而战

场上的失利也是塞奥达哈德的统治很快被推翻的重要原因^{[19](109-111)}。无法直接控制军队,导致阿玛拉松塔难以建立军功,从而提升个人威望,无法凭借军队强化其摄政基础。这些就使得阿玛拉松塔在面临危险之时只能束手就擒。

以上情况表明,在女性对男性具有高度依附性的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女性缺乏独立掌握军政、外交等公共权力的基础。在罗马法、社会风俗以及大众意识所构筑的社会框架之下,即便在特殊时期短暂执政,女性的政治权力往往也因性别而遭到质疑与挑战。这是阿玛拉松塔摄政时期屡遭哥特贵族非议并诱发王国内部分争的重要原因。阿塔拉里克的早夭导致阿玛拉松塔丧失了权力的根本来源,并促使阿玛拉松塔仓促扶持塞奥达哈德上台,新王的出现则加速了阿玛拉松塔政权的垮台。由此可见,在古代晚期地中海男权社会的权力框架中,女性亲自长期执掌公共权力具有相当大的难度。王室女性更多是作为政治联姻的工具来拉拢各派势力,或是通过与非王室出身的男性联姻,进而为其执掌政权提供合法性^[59-60]。

四、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西罗马帝国政权的崩溃,受到东罗马皇帝泽诺的推动,塞奥多里克率部进入亚平宁半岛并建立东哥特王国。作为统治者,塞奥多里克的策略是尽量获得东罗马帝国对其新建政权的认可,同时借鉴罗马治国理念、教育模式,达到巩固哥特人在亚平宁半岛统治的目的。至塞奥多里克去世时,东哥特王国的国家建构、政权建设与文化发展都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塞奥多里克去世后仅20余年,东哥特王国就在与东罗马帝国的战争中灭亡。东哥特王国发展趋势的变化与阿玛拉松塔摄政政权的兴衰存在直接的关系。阿玛拉松塔政权的兴衰,又与其“亲罗马”政策同哥特贵族族群意识之间的矛盾与对抗存在紧密联系。

从阿玛拉松塔的政权兴衰可见,从古代到中世纪,王室女性凭借显贵出身拥有更多接触并参与政治事务的机会。然而,与同时期的男性掌权者相比,王室女性能够参与政治的概率远远不及

男性政治人物。只有在王室内部分男性因各种特殊情况无法掌握权力并导致政权存续出现危机时,王室女性才能获得机会替代男性行使政治权力。一旦危机解除,国家政治体系中出现了新的男性掌权者,女性就有可能再度沦为政治陪衬,甚至如阿玛拉松塔一样彻底失势乃至丧命。阿玛拉松塔摄政政权垮台是东哥特人在亚平宁半岛的统治步入终结的序幕。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一世以此为借口向东哥特王国发动战争,东哥特王国最终灭亡,东罗马帝国国力也因为这场绵延20年的战争而大受影响,古代晚期地中海世界的政治格局以此为契机再次发生重大变化。

注释:

- ① “蛮族”一词出自约定俗成,无关任何个人观点,特此说明。
- ② 关于族群的概念,学者帕特里克·阿莫里指出:族群是人类学的概念,指拥有共同血统,在语言、服饰、宗教、法律、习俗等文化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的群体。参见: Patrick Amory,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 (489—554),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4. 关于认同的概念,国内学者钱雪梅认为,认同是一种特殊的集体现象:一个群体的成员具有重要乃至根本的同一性,群体成员团结一致、有共同的性情意识及集体行动。参见:钱雪梅:《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民族研究》2006年第6期,第17页。

参考文献:

- [1] JORDANES. The Gothic history of Jordanes[M]. New York: Barnes & Noble, Inc., 1960.
- [2] CASSIODORUS. Middlesex: The letters of Cassiodorus Magnus Aurelius Cassiodorus[M]. Middlesex: The Echo Library, 2006: 314.
- [3] AGATHIAS. The historie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 Co., 1975.
- [4] BARKER J W. Justinian and the later Roman Empire[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66.
- [5] CAMERON A, PERKINS B W, WHITBY M. The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14, late antiquity: empire and successors, A.D. 425—600)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6] EVANS J A. The emperor Justinian and the Byzantine Empire[M].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Press, 2005:

- 69-71.
- [7] BURY J B.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from Arcadius to Irene (Vol.1) [M]. New York: Cosimo, Inc., 2008.
- [8] WOZNIAK F E. East Rome, Ravenna and western Illyricum: 454—536A.D.[J].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1981(3): 351-382.
- [9] BROWNING R. Justinian and Theodora[M].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Ltd, 1987.
- [10] LAFFERTY S D W. Law 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Theoderic the Great[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1] HOOFF L V, NUFFELEN P V. The historiography of crisis: Jordanes, Cassiodorus and Justinian in mid-sixth-century Constantinople[J]. *The Journal of Roman Studies*, 2017(107): 275-300.
- [12] BAYNES N H. Justinian and Amalasuntha[J].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925(40): 71-73.
- [13] ROCCA C L. Consors regni: A problem of gender? The consortium between Amalasuntha and Theodahad in 534[C]// NELSON J, REYNOLDS S, JOHNS S. Gender and historiography: Studies in the earlier Middle Ages in honour of Pauline Stafford, 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 2012: 132-144.
- [14] 马锋. 东哥特王国的罗马化[J]. *世界历史*, 2020(2): 29-44.
- [15] 马锋. 东哥特王国的二元制国家结构分析[J]. *外国问题研究*, 2019(2): 52-59.
- [16] 康凯. “蛮族”与罗马帝国关系研究述论[J]. *历史研究*, 2014(4): 165-177.
- [17] CASSIODORUS. *Variae*[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8] 陈志强. 拜占庭帝国通史[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 79.
- [19]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M]. Book V.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 [20] PROCOPIUS. History of the wars[M]. Book II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 [21] MOORHEAD J. Culture and power among the Ostrogoths[J]. *Klio*, 1968(68): 112-122.
- [22] LOT F. The end of the ancient world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Middle Age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6.
- [23] 朱塞佩·格罗索. 罗马法史[M]. 黄风, 译.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9: 308.
- [24] GREGORY. The history of the Franks[M].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74: 108.
- [25] JOHN. Chronicle[M].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916: 114.
- [26] MARCELLINUS. The chronicle of Marcellinus[M]. Sydney: University of Sydney, 1995.
- [27] MALALAS J. The chronicle of John Malalas[M]. Sydney: Sydney University Press, 2006.
- [28] EVAGRIU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Evagrius Scholasticus[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0.
- [29] THEOPHANES. The chronicle of Theophanes Confessor: Byzantine and near eastern history, AD 284—813[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
- [30] WHITBY M, WHITBY M. Chronicon paschale, 284—628 AD[M].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1989: 106-107.
- [31] HALSALL G. Barbarian migrations and the Roman west, 376—568[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2] DONNELL J J O. The ruin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M]. Pymble: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Pty Ltd, 2008.
- [33] TREADGOLD W. A 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state and society[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77.
- [34] 钱雪梅. 从认同的基本特性看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关系[J]. *民族研究*, 2006(6): 16-25.
- [35] MARTINDALE J R. The prosopograph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A.D.395—527)[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65.
- [36] AMORY P. People and identity in Ostrogothic Italy(489—554) [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37] GIBBON E. 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Vol.4[M]. Holicong: Wildside Press, 2004: 323.
- [38] DIEHL C. Byzantium: greatness and decline[M]. New Brunswick and New Jersey: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57: 176.
- [39] PHARR C. The Theodosian code and novels and the Sirmondian Constitution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2.
- [40] TALBOT A M. Women and religious life in Byzantium[M]. Aldershot and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2001.
- [41] 董晓佳. 《塞奥多西法典》的编纂、流布与拉丁文本的整理[J]. *古典学评论*, 2022(8): 3-23.
- [42] MATHISEN R W. People, personal expression, and social

- relations in late antiquity[M]. Vol.1.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 [43] HALDON J. The social history of Byzantium[M]. Chichester: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9.
- [44] GRUBBS J E. Women and the law in the Roman Empire: A sourcebook on marriage, divorce and widowhood[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271.
- [45] RAUTMAN M. Daily life in the Byzantine Empire[M]. Westport, Conn: The Greenwood Press, 2006: 25.
- [46] JOHN E. The third part of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 of John Bishop of Ephesu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60: 183.
- [47] SOUTHON E. Marriage, sex and death: the family and the fall of the Roman West[M].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017: 182.
- [48] SOZOMEN.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M].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419.
- [49] 弗莱德加. 弗莱德加编年史: 第4卷[M]. 陈文海,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7: 110–111.
- [50] 都尔教会主教格雷戈里. 法兰克人史[M]. 寿纪瑜, 戚国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356.
- [51] CHEW K. Virgins and eunuchs: Pulcheria, politics and the death of emperor Theodosius II. [J]. *Historia: Zeitschrift für Alte Geschichte*, 2006(2): 207–227.
- [52] 苏拉密斯·萨哈. 第四等级: 中世纪欧洲妇女史[M]. 林英, 译.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3: 187–188.
- [53] ARNOLD J J. Theoderic, the Goths, and the restor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D].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8: 42.
- [54] WIMBUSH V L, VALANTASIS R. Asceticism[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34.
- [55] JONES A H M. 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4–602: A social,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ve survey[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64: 274.
- [56] COOPER K. The heroine and the historian: Procopius of Caesarea on the troubled reign of queen Amalasuentha[C]// ARNOLD J J, BJORNLIIE M S, SESSA K. A companion to Ostrogothic Italy,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2016: 296–315.
- [57] MAGIE D. The scriptores historiae augustae[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2: 249–251.
- [58] SOCRATES. The ecclesiastical history[M]. Michigan: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1957: 116–118.
- [59] ZACHARIAH. Syriac chronicle[M]. London: Methuen & Co., 1899: 185.
- [60] PAUL. History of the Lombards[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74: 193.

Women's power and ethnic identity: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dual dimension of Amalasuntha's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IU Rongro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China)

Abstract: In the year of 526, Theoderic, the founder of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died, and the throne was inherited by Athalaric, Theoderic's grandson. As Athalaric was little, his mother Amalasuntha began her regency career. Amalasuntha intended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oman elements and Germanic elements in the Kingdom. This goal led to irreconcilable contradictions with the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ethnic consciousness of the Goths, so much so that her regency caused the opposition of the Goth aristocratic forces. After the death of Athalaric, Amalasuntha lost power and died immediately. In late antiquity in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there lacked social environment, legal basis and power mechanisms to ensure women's independent governance. So, women's power had a remarkable dependence, which was the key reason for the collapse of the Amalasuntha's regency. And the downfall of the Amalasuntha's regime became an important turning point for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Mediterranean world during that period.

Key Words: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Amalasuntha; ethnic identity; women's power

[编辑: 苏慧]